

文化自觉与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

张杨阳 杨晓

摘要: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际遇中,文化自觉是中国学人科学教育价值取向嬗变的根基血脉。志在教育救国的梁启超就对西方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导入、普及和本土化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觉。基于对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,他不仅实现了自身科学教育价值取向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,继而到以人为本理性的强化,还以此论证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内涵和未来走向,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本土化开拓了新天地。

关键词:文化自觉;科学教育;价值取向;梁启超

费孝通认为,“文化自觉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地位,对其文化的来历、形成过程、特色和发展趋向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,但既不主张“复旧”,也不主张“全盘他化”。^[1]作为新旧历史交替之际、中西学说激撞之时的思想急先锋,梁启超总是走在时代文化教育的前沿,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本土化历程中当之无愧的引航者。他紧握科学、率先从教;译介大量西方科学书籍,积极推广科学知识;发表众多科学教育言论,踊跃传达自我思考和期许。更为重要的是,他终其一生,“对待科学的态度,始终贯穿一种内在的‘文化理性’”^[2],对待科学教育的态度也相应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觉。清末时期,梁启超率先通过“公羊三世”、“学体术用”等传统文化教育理念,逐步肯定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,以推进它的普及和完善。民国早期,梁启超及时在“‘理智’与‘情感’的疏中限制科学的效率”^[3],基于“心即理”等传统文化教育理念,肯定人文教育的科学性,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与统一,以强化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。本文从文化自觉视角解读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嬗变,剖析近代科学教育发展的内源性基因,以期对当下我国科学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一定的历史参照系。

一、继承“公羊三世”学说,推崇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

甲午战争后,目睹晚清政府的军事羸弱、内政腐朽和外交无能,志在维新的梁启超继承并深化了康有为所推崇的“公羊三世”学说,且以此论证了“开民智”对清末社会发展的重要性。他不仅从智力因素上分析了自古至今社会发展内在动因的终极演变,即“据乱世以力胜,升平世智力互相胜,太平世以智胜”^[4];更从智力因素上分析了19世纪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借“制器”来灭他国,将全球的十分之九都纳入统辖的技术之强。梁启超断言,值世界发展运势由乱世向升平世和太平世过渡之际,国际竞争必然聚焦于民众智力之强,“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,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”^[5],疾呼中国要自强于当时,唯有开民智为第一要义。

梁启超极其渴望通过实用科学知识的加入来变科举、兴学校以开民智。首先,他对清末科举教育制度的无用深恶痛疾,感叹唯有实用科学才是其变革之关键。在他看来,科举导致生员没有受到专门的科技学习和训练,务农不知植物、做工不明制造、经商不懂万国物产、当兵不会测绘算数;科学却为西方政治之根本和富强之原由,以科学来变科举已经势在必行。他认为变科举的上策在于从制度上将科举与学校合

收稿日期:2018-07-18

作者简介:张杨阳,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;杨晓,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。(大连/116029)